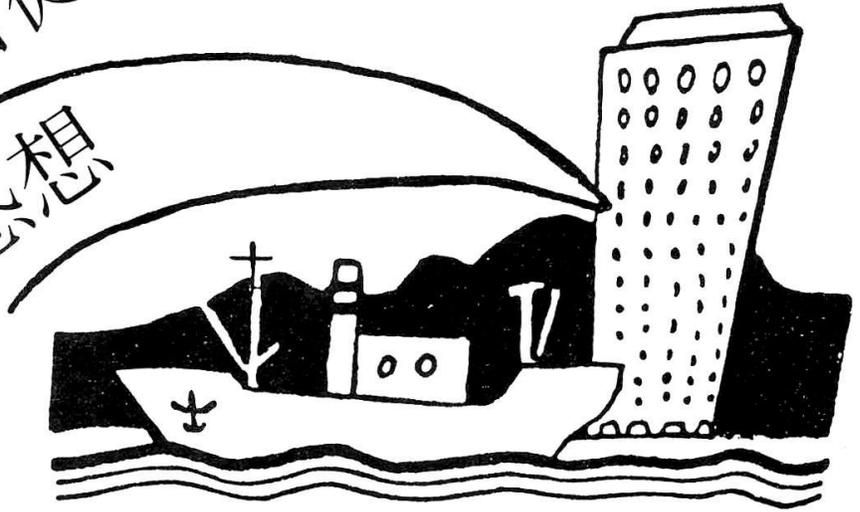


# 一位香港基督徒 對愛國的思想

陳秀蓮



按：爲了擴寬對愛國的看法，本刊邀請不同人士供稿。本文是一位基督徒中學教師的作品。本刊不但感激作者的慷慨幫忙，也多謝新華社的朋友把作者轉介給我們。

香港中文大學有個教授，是生于斯、長于斯的「老香港」。去年，他由于對香港前途感到困擾，遠赴異國去跑了一次，本想移民到那裏去；但月前又回到香港來。他的結論是：自己畢竟是中國人，香港畢竟是中國人的地方。離開越久，思念之情越切。

這位老先生早年曾經出洋吃過「鹹水」，他的博士學位就是在牛津大學獲得的。他的英語很好，不存在語言溝通的困難。然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生活習慣不同，這一切使得他難以適應，從而使他冷靜下來，重新考慮，要把自己的命運和香港的前途連結在一起……。

我們這個國家，世世代代形成了愛國的光榮傳統：中華兒女爲反抗外來侵略，爲保衛祖國獨立、自主和統一，不惜毀家紓難，不惜流血犧牲，湧現了成千上萬的民族英雄

，譜寫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史詩。直到今天，每當我們緬懷起屈原、岳飛、文天祥、林則徐、鄧世昌等等人物，就自然而然地肅然起敬，爲他們的愛國事蹟深深感動。這種心情，有如一個虔誠的信徒對摩西、大衛、約翰、雅各、西門彼得的敬重一樣。

對中國人來說，這種感情是自然的。祖國秀麗的河山，善良的人民，悠久的歷史，都使我們感到自豪。即使你用社會學、邏輯學、心理學或是自然科學來作理性分析，也不能否定這個答案：相對於外星人，我是地球人，相對於白種人，我是黃種人；相對於外國人，我是中國人。正因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應當愛中國。

有人說，當祖國美好的時候，我們當然會容易愛她——誰不愛美麗而體貼的母親？但當她遇到挫折、遇到分裂的時候，我們又



##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位真正 的愛國者兼虔誠的基督徒

應當怎樣看待她呢？

誠然，我們祖國有過值得驕傲的時期，也有過曲折、危難和屈辱的年代。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愛國的仁人志士，不論祖國處在什麼情況下，始終熱愛國家，站在歷史的前頭，推動歷史前進。遠的不說，就拿大家熟悉的孫中山先生為例，他既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又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滿懷愛國熱情，率領愛國志士，為祖國和民族的獨立、民主、自由，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終於推翻了清王朝，廢除

了長達二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他為祖國奮鬥了一生，直至最後一息。

我們回顧一下歷代的仁人志士，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僅表現在為反抗外來侵略、爭取祖國獨立、統一上面，而且表現在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上面。他們在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方面，給國家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早在兩千年前，就有傑出的水利專家李冰，在四川省建築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成為我國治山治水的創舉。在近代史上，就有鐵路工

程師詹天佑，胸懷愛國壯志，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建成了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贏得了海內外的稱讚。五十年代以來，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事業的高級知識分子就更是越來越多。例如地質專家李四光，對我國的地質狀況進行了大量的考察，歷盡了千辛萬苦，終於弄清了中國地質結構的真實面貌，打破了「中國貧油」的結論，為祖國的地質科學和石油開發事業，建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像這樣的事例還可以舉出很多。

我們看到，最近幾十年來，祖國確實是在曲折中前進的。特別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間，中共領導的錯誤給國家帶來了苦難。我們不少教友和知識界人士受到了不應有的折磨。然而，這畢竟已成爲過去了。許多到過大陸訪問的教友，看見重開教堂、傳揚福音的事實，認爲應以和解爲重，并建議曾經與大陸疏離的教會再度與大陸人民多作接觸，重新認同，言歸於好。這是很有遠見的。

一位從香港赴美留學的青年科學家說得好：「不管祖國怎樣貧窮落後，她總是我的祖國，就像自己的母親，不管她怎樣體弱多病，她終歸是我的母親」。我想，我們教會的領袖、教牧和教友，都應高瞻遠矚，增強信心，不斤斤計較過去的恩怨，不去苛責自己的「母親」，同心同德，發憤圖強，爲主分憂，爲國効力，才是道理。

有人說，生活在大陸的教徒，自然應當爲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的教徒，我愛的是香港政制，愛的是香港的生活方式，愛的是充份的宗教信仰自由，倘若「九七」問題不合我意，我可自由離開，移民他國，有何不可？

誠然，我們有各種各樣的藉口離開她，

有人確是這樣做了。沒有必要怪責他們，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但中國是你和我的。中國未來，我們有責任。再說，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這是連英國人也承認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史密夫寫過一本書叫做《不平等條約》，對此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是說要尋根嗎？對一位基督徒來說，假使我們連自己的國家也不敢認同，我們又那能贏得自己國家和人民的認同呢？我們若不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去體會中國人的心境，我們怎能體驗中國信徒的生活和心聲呢？教會若不植根于本土，它又將是怎樣的教會呢？

至于說，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的基督徒，這當然是對，但是，準確的說，我是中國的香港人，是住在香港的中國基督徒。首先，我們是中國人，作爲中國人的一份子，我們不能無視這個現實。既然香港屬於中國領土，那末，中國要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設立特別行政區，這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了。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應當留在香港，堅持宗教事工，傳揚福音。善牧是不可以離開他的羊群的。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件中最重要的是愛。」在同中國大陸隔絕了多年之後，如今要體現對中國的愛，最重要的就是要泯除猜疑，消除隔閡，在愛中聚合，在愛中合一。

中國古語說：「分久必合」，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分離太久了，我們作爲一個基督徒，難道不應促進這種合一嗎？

《詩篇》說：「弟兄和睦相處，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放眼人世間，放眼中國、台灣和香港，如果還存在分裂局面，溝通、包容、合作、愛心又怎能建立得起來呢？

我個人認識是：愛主和愛國是統一的。我們要做上帝的兒女，同時又做祖國的兒女。道成肉身的基督，并非一個無國籍的游民，而是具有特定國籍的。他熱愛本民族的文化 and 宗教傳統，他看到本民族處於當時的羅馬的統治之下，爲之哀哭。聖經中也有許多反映愛國感情的篇章。《詩篇》第一三七篇《被擄于巴比倫者之哀歌》和第一二六篇《俘囚返錫安讚美耶和華》都是一個例證。所以，我們香港的中國教徒，應該有一個中國的自我。

在歷史上，像摩西、尼希米、但以理等先知，都與自己的民族認同，爲了延續他們民族的生命，他們都勇於挺身而出，爲促進民族的美好統一發展而努力獻身，從民族的經歷中表現上帝的作爲。他們懂得：上帝是創造主，祂與世人及世界有密切的關係，祂容不得侵略、欺負、不公義和罪惡。《申命記》和《使徒行傳》都有記載：至高者將地土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立定萬民的疆界。因此如何促進中國的合一和了解，就是當

前香港教會一項最重要的事工。我們不是常常說，要對時代回應嗎？我們要有勇氣的走出第一步，在「收回主權，保持繁榮，保持社會制度不變」的使命下聯合起來，表達對中國合一意願的誠意。這是當前教徒愛心的應有表現。

當然，難免有人擔心：未來中國對香港宗教的政策不知會怎樣？其實，在中英談判中，中國政府已保證一九九七年之後，五十年內保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既然如此，宗教政策當然是維持目前的現狀了。中國基督教協的領袖和廣東的熊真沛牧師都已先後說明不必像大陸那樣推行「三自」（自治、自傳、自養），而且還可以照舊同國際的宗教組織保持聯繫。我想，這正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體現。我們是不必顧慮徬徨的。

我們都是天國的子民，又是地上的中國國民，爲了中國的未來合一，我們應當提高自己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維護國家榮譽，維護民族尊嚴，在香港爲福音作見證。

## 國父孫中山先生與宗教的關係

-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 生於廣東省中山縣（當時稱香山縣）翠亨村。
- 一八七七年 時十一歲，遇美籍傳教士克爾於翠亨村。
- 一八七九年五月 赴檀香山。
- 一八八〇年 入教會所辦的埃奧蘭尼（IOLANI）學校，校長爲韋理士主教（BISHOP ALFRED WILLIS），開始參與主日崇拜。
- 一八八三年 入教會所辦的聖路易中學（ST. LOUIS COLLEGE），篤信基督教。
- 一八八四年 年十八歲，離檀香山返國，旋赴香港，在公理會喜嘉理牧師（REV. C. R. HAGER）手中領受浸洗，洗名註冊時爲「孫日新」。
-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 發生「倫敦蒙難」事件，藉宗教故事感動清使館英籍僕人柯爾，爲其奔走求援。
- 一九二五年三月 病逝北京，享壽五十九歲，以基督教儀式殯葬。